本版编辑：木　言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124

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

□ 康井泉

抗战时期，党始终站在“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的认识高度，竭尽心力培养和造就最好的干部，创办并发明无限期大学，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干部队伍的数量和素质实现了空前的飞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的人才保证、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共产党的大事”。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当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干部数量严重不足。二是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多数没有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其思想与行为上还存在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符的东西。当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局势相对平稳，这就为党集中时间进行干部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面对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干部教育的形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大事”和“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达30多所，制定干部教育方针和政策，从内容原则和具体措施方面入手规范干部教育工作，坚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实施，创出了延安特色，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干部教育第一”。1939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文件中还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我们党把培养和造就“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的领导人才作为“战斗任务”来实施。党中央进驻延安城之后，抓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延安的难得机遇，把自己的干部当作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而倍加珍爱，从抗战前线抽调了一批优秀的高中级干部到延安学习，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克服本领恐慌，以最大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英才，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党的领导人亲自实践着“干部教育第一”思想。1942年至1946年，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学习和时局》《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时局问题及其他》等报告，刘少奇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等。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曾到中央党校参加有关活动或给学员作报告。

三十余个文件规范干部教育。当时，党中央先后出台了30多个重要文件，从组织制度上规范了干部教育工作。1938年9月至11月，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1月3日，中央出台《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教育”；1940年3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20日，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1年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着重指出了在教学中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同日，中央政治局还发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边区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在职干部学习应明确规定定期考试制度，随时检查其成绩案》，把考试作为一种硬性制度固定下来，建立了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长效机制等等。这些文件充分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对于保证抗战胜利、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之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意义；同时，这些重要文件对干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学组织进行了规范，使干部教育机制更加符合抗战需要、边区实际和干部需求。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品格和作风应该是：懂得马列主义，具有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不怕困难、勇敢向前，不谋私利、胸怀坦白、忠心耿耿地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创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大批重要著作，为干部教育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教材。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1941年8月，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范文澜、艾思奇等组织编辑马恩列斯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集，中央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集等经典的学习资料，主要包括马列原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党中央对历史和国情的教育也是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及包括22个文件的《整风文献》，其中，既有现实文献如《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领导人报告如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又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等。通过大量的理论、历史和国情学习，克服了党内错误思想，增强辨别是非能力，使干部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成就载入党史。党在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把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习理论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其重大历史成就在于：政治上，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和认识，加强了党的政治团结；学风上，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组织上，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和理论工作者，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普遍意义，对我们当前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

文史天地

为官不为当止

□ 李　泉

将为官不为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说明了中央领导对“不为”问题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为官不为现象渐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为官为何不为？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六项禁令的颁布，厉行节约条例的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号角的吹响，使干部头上套上了“紧箍咒”，并且越来越紧，严上加严。有些人因“为己所为”无以为继，所以工作热情骤减，积极主动性不高，无奈之下，大呼“为官不易”，为官不为，其实是“为官不愿为”。

为官不为是“无能”的表现。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快，有些领导干部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进步，不与时俱进，造成能力退化，落伍于时代的发展，无法胜任工作，竟然还恬不知耻大呼官难当。这里的为官不为其实是“为官没能力为”。

为官不为是新常态下“失态”的表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适时进行政策调整也成为常态，少数干部对于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先做，哪些后做，全然不知，心中无数，在形势变化面前，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为官“失态”，其实是不知如何为。

为官不为当止，那么如何去止呢？

以思想教育打开“有为”开关。思想是行动的源头，少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是思想认识出了问题。要使干部“为官有为”，首先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强化宗旨意识，使他们牢固地树立“为民所为，为官必为”“干部就要担当”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司其职就要尽其责”，认识到为官不为是失职、是渎职、要问责，切实解决好“不想为”的问题。

加强学习、实践，提高“有为”本领。新常态需要新本领。领导干部长期的工作实践会积累不少管用的经验，但也有一些老套路、老本领可能会“落伍”，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为此，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在学习中提高完善自己，在实践中汲取智慧营养，尽快提高自我、完善自我，铸就过硬的本领，尽快适应“新常态”，切实解决好“为官没能力为”“不会为”的问题。

着力转变作风，营造“有为”氛围。为官不为作为不正之风，不可等闲视之。要从严从实抓党风，持之以恒改作风，努力营造雷厉风行，有事“立马干，马上干”的良好氛围，让混官、庸官、懒官没有市场，使清廉为官、事业有为的干部有为有位，为因敢于担当而得罪人的干部撑腰，克服庸政、惰政现象，解决懒散“不快为”的问题。

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树立“有为”导向。治理庸政、惰政，关键还要从机制上下手。少数官员之所以能混“官场”“滥竽充数”为官不为，一方面是他们思想觉悟不高、宗旨观念不强、本领不够等原因引起，也与政绩考核机制有一定的关系。要积极探索，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和完善干部退出机制，为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搭建平台，让精神懈怠、能力滑坡、不思进取的庸官懒官受到应有的惩罚，对不为行为问责，使之为不为付出代价。而对那些有“大作为”“创伟业”的干部要通过适当方式予以激励，以提高有为者的积极性，解决有为的动力问题。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

随　笔



高玉海/书

多角度认识和防范贿赂腐败

□ 孙宛永

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逐步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做出的顶层设计。从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揭露的腐败案件来考察，贿赂腐败在腐败案件中始终占据十分突出的位置。因此，严惩贿赂犯罪是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只有准确区分贿赂犯罪的具体情节，才能依法精准切中行贿、受贿犯罪的要害，铲除贿赂腐败滋生的土壤，夺取反腐败的决定性胜利。

贿赂犯罪包括行贿和受贿两种犯罪行为，前者是指行为主体为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给予权力的执掌者以财物和其他利益的行为；后者是指权力的执掌者利用职务之便，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前提，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和其它利益的行为。贿赂犯罪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也包括非国家公职人员，贿赂的本质是权力和利益相勾结的非法交易，侵害的是权力的廉洁性，危害的是公平竞争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冲击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伦理，必须严于防范，坚决铲除。

众所周知，行贿和受贿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是沆瀣一气的“孪生兄弟”。在贿赂犯罪中，受贿者也并非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行贿者也并非始终是“弱势群体”，即所谓没有行贿，何谈受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有以权谋私的“索贿者”，也有主动行贿的“寻租者”。从某种意义上看，行贿行为对于贿赂犯罪更具启动性和本源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握贿赂腐败的五种类型。

被动行贿，但行贿的结果并未使行贿人获得不当利益。即受贿人凭借掌握权力的地位主动索取贿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直接决定着贿赂腐败的自始至终；而行贿者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这一腐败过程中始终居于被动乃至被迫地位。受贿的结果既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又侵害了权利的廉洁性。很显然，在这种贿赂犯罪中，必须依法严惩受贿者，免处行贿者，且将行贿的财物退还行贿者。

被动行贿，行贿的结果使行贿人获得了不当利益。即受贿人利用掌握的权力，主动索贿，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行贿人虽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受贿、行贿的结果侵害了权力的廉洁性，贿赂双方均谋取了不法利益。在此类情形中，贿赂双方都应依法受到惩处，但在量刑上应适当考虑行贿人的被动情节。

共谋贿赂，即贿赂双方为了谋取各自的非法利益，共同策划并实施了贿赂行为，且达到了各自的目的。其特征是双方均有主动实施贿赂行为的意图，其结果是侵害了权力的廉洁性，行为人获得了各自的非法利益。对此，贿赂双方均应受到同等刑罚。

主动行贿，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法利益，主动乃至围猎受贿人，诱使或迫使受贿人受贿，且获得了不当利益。在这种情形中，行贿人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直接决定着腐败行为的全过程，而掌握着权力的受贿者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腐败过程中居于被动乃至被迫地位，行贿、受贿的结果侵害了权力的廉洁性，贿赂双方虽然都获得了不法利益，但二者作用明显不同。如赵少麟之子赵晋，行贿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这类案件中，贿赂双方均应受到惩处，但在量刑上可适当考虑受贿者的被动情节。

主动行贿，但未获得不当利益。这又可分为四种情形即行贿人主动放弃、行贿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受贿人主动不作为或受贿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贿赂目的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形中，虽然行贿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受贿人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行贿的目的并未得逞，属贿赂腐败中止或贿赂腐败未遂，应根据具体情节，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在反腐败实践中，“严惩受贿，轻处行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思维定势和办案理念，为打击受贿而放纵行贿的案例也屡见不鲜。这虽然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但从长远看，是一种短视行为。当行贿成本很低乃至没有成本的时候，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必然引致人们靠行贿办事而不是依法办事，行贿文化则由此形成。长此以往，何谈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何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何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必须准确区分行贿、受贿行为在贿赂腐败中的具体角色和作用，紧紧抓住贿赂腐败的发起者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区分具体情节，严格罪与非罪的界限，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打，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有效遏制乃至消弭贿赂腐败，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

时政连线

被尘封的史书：《中国的抗战》

□ 周文琪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是当时欧美人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影响。其主编鲍威尔于1936年6月，派斯诺前往陕北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采访。1936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连载斯诺的专访《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引发全世界读者极大的关注。斯诺后来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详细介绍了中国红色区域的情况，这部英文著作曾在《密勒氏评论报》做过介绍。此后，在国共关系变化的每个重要节点，《密勒氏评论报》几乎都有克制而准确的报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密勒氏评论报》在很多方面的报道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于1938年10月编印出版的两厚本《中国的抗战》一书，其主编鲍威尔亲自为该书作序，他指出：当1921年华盛顿军缩会议的时候，参会的“列强”大半都很恳挚，设法用国际协定的方式，替中国进行国家设计。可是在华盛顿会议中，各国踊跃签订的条约，仅能维持十年的和平，因为缺乏诚意，毕竟成了废纸，尤其是日本帝国的领袖们，他们见有可以营私利、张国威的机会，便不惜牺牲一个武备较差的邻国。中国目前尚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一次的战争，正给予中华民族一个博取自由的良机，由此奠定的基础，一定比那些口不应心的语言更可靠、更永久。无论从国内的民众，或国际上的地位看来，这是一个解放的斗争。他说这部书为这划时代的大战，逐日记下一些重要的事实。

《中国的抗战》分为上下两部，采用两种方法记载，一种是日记体，是根据“japan’s war in china”一书译出的；一种是系统的叙述。在日记体方面，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7日——1938年1月2日；第二阶段从1938年1月3日——7月7日。

在叙事中，详细报道了卢沟桥事件的起因及其经过。7月28日宋哲元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后，北平发生大战，132师师长赵登禹、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团河之役英勇牺牲。“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国军力保闸北江湾76天，奉命退守苏州河南岸，其88师之掩护部队五百人，雄踞苏州河北之“四行储蓄会仓库”力敌日军，在团长谢晋元率领下坚守不屈，力挫日军大举之进攻，谢绝英美军事当局缴械退入租界之劝告，誓与闸北最后一片土地共存亡，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仓库屋顶飘扬。其间一女童子军冒险潜入，献大国旗一面，至此，两面国旗高高飘扬，全体将士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其忠勇壮烈之慨，已为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叙事中用大量篇幅报道了中国红军已改组为第八路军，隶属南京军事委员会，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军长，立誓抗日到底。9月27日的报道写到：“在平型关败退之日军，已进展至雁门关，将与八路军开始大战”；10月5日再报道，八路军克复山西北部之清平及朔县，日军死伤极众，且遗弃大批军火。

与文字报道同时，还配发大量影像资料，如国军“集中待命”“出征前线”“机械化部队疾驶前进”的阵容；八路军“集中训话”“宣誓就职”以及群众慰劳前线将士做棉衣、收集慰劳品、救护和慰问伤兵等；日本侵略者对普通百姓的残酷杀戮的影像：“平民的厄运（一）（二）”“难民之泪（一）南京难民区的死尸，（二）劈伤的难民”等。

全书的另一部分是系统的叙述，其内容分两个阶段。

战事第一阶段：一、卢沟桥的烽火。二、平津河北战役。三、察绥与山西战役。四、江南战役。五、鲁北鲁东战役。六、中国空军战史。七、第一阶段中的政治兴革。八、第一阶段的经济动向。九、第一阶段的国际外交。十、结论。

战事第二阶段：一、鲁北晋南战役。二、徐海战役。三、中原战役。四、大战前夕的华商。五、沦陷区内的战争。六、空军战绩。七、半年来的政治兴革。八、半年来的经济动向。九、半年来的国际外交。十、群魂现形录（笔者注：在这里《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们，将在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在南京成立的伪“华中维新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汉奸名单全部公之于世，把这些他们称之为历史上的“渣滓残物”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十一、编辑后记：“我们编辑同人所能够告慰的就是给编写中国历史的人帮了一点忙，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战争保存了一部分史料。中国的抗战正在开展，我们的工作，也正在继续不断地开展，直到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完成，才允许我们停止。中国的抗战史是血写的，是粗大的筋肉的表演，是一部力的结晶，我们编辑同仁一定要把这种光荣的血和粗壮的力给他们在纸上表现出来，传之永久无穷。要这样，才能使未来民族的青年知道中华民族过去困苦的遭遇与光荣的搏斗，以及自由独立的可贵。使他们知道一种教训，随时知道警惕。”



《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出版发行的《中国的抗战》第一集与第二集

中央党校老干部纪念抗战征文选登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